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刘东 主编

日本发现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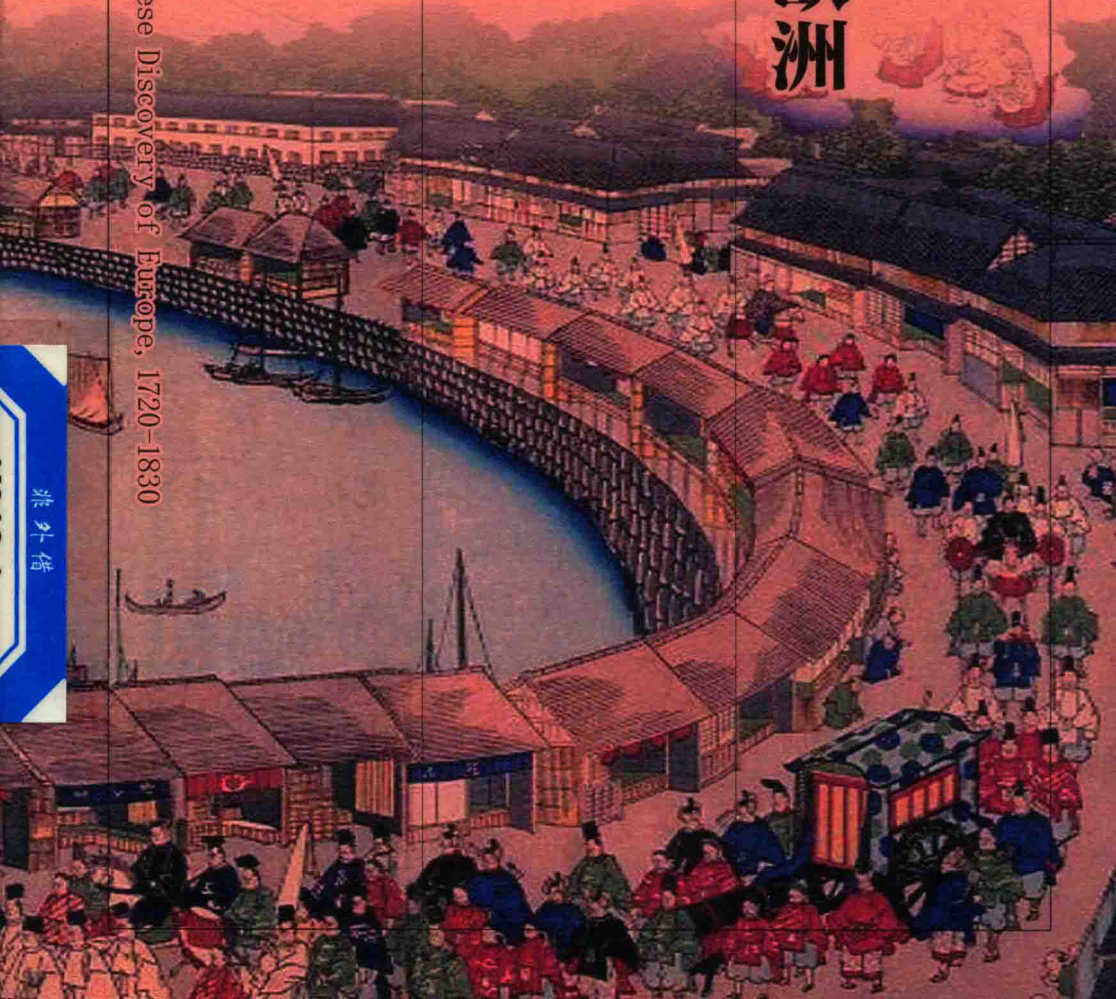
1720-1830

「日」唐纳德·金 著
孙建军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 1720-1830

非虚构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刘东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本发现欧洲

1720-1830

〔日〕唐纳德·金 著

孙建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日)唐纳德·金著;
孙建军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3

书名原文: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
1720-1830

ISBN 978-7-214-21065-4

I. ①日… II. ①唐…②孙… III. ①日本—近代史
—1720-1830 IV. ①K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8820 号

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 1720 - 1830 by Donald Keen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52, 1969 by Donald Keene.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 sup. org](http://www.sup.org).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9-206

书 名 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

作 者	唐纳德·金
译 者	孙建军
责任编辑	曾 偲
责任校对	鲁从阳
责任监制	王列丹
装帧设计	刘葶葶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 jspph. 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页5
字 数	207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1065-4
定 价	30.00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这又会是一个卷帙浩繁的移译工程！而且，从知识生产的脉络上讲，它也正是上一个浩大工程——“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姊妹篇，也就是说，它们都集中反映了海外学府（特别是美国大学）研究东亚某一国别的成果。

然而，虽说两套书“本是同根生”，却又完全可以预料，若就汉语世界的阅读心理而言，这后一套丛书的内容，会让读者更感生疏和隔膜。如果对于前者，人们还因为稟有自家的经验和传统，以及相对雄厚的学术积累，经常有可能去挑挑刺、较较劲，那么对于后者，恐怕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难以置喙。

或许有人要争辩说，这样的阅读经验也没有多少不正常。毕竟，以往那套中国研究丛书所讲述的，乃是自己耳濡目染的家常事，缘此大家在开卷的过程中，自会调动原有的知识储备，去进行挑剔、补正、辩难与对话。而相形之下，眼下这套日本研究丛书所涉及的，却是一个外在文明的异样情节，人们对此当然只会浮光掠影和一知半解。

不过，设若考虑到这个文明距离我们如此之近，考虑到它在当今国际的权重如此之大，考虑到它跟传统中华的瓜葛如此之深，考虑到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产生过如此严重的路径干扰与路径互动，那我们至少应当醒悟到，无论如何都不该对它如此陌生——尤其不该的是，又仅仅基于一种基本无知的状态，就对这个邻近的文明抱定了先入为主的态度。

还是从知识生产的脉络来分析，我们在这方面的盲点与被动，

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长期政治挂帅的部颁教育内容所引起的。正如上世纪50年代的外语教学,曾经一边倒地拥抱“老大哥”一样,自从60年代中苏分裂以来,它又不假思索地倒向了据说代表着全球化的英语,认定了这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国际普通话”。由此,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所有其他非英语国家研究的学者,就基本上只能来自被称作“小语种”的相对冷门的专业,从而只属于某些学外语出身的小圈子,其经费来源不是来自国内政府,就是来自被研究国度的官方或财团。

正因此才能想象,何以同远在天边的美国相比,我们反而对一个近在眼前的强邻,了解得如此不成正比。甚至,就连不少在其他方面很有素养的学者和文化人,一旦谈起东邻日本来,也往往只在跟从通俗的异国形象——不是去蔑视小日本,就是在惧怕大日本。而更加荒唐的是,他们如此不假思索地厌恶日本人,似乎完全无意了解他们的文化,却又如此无条件地喜欢日本的产品,忽略了这些器物玩好的产生过程……凡此种种,若就文化教养的原意而言,都还不能算是完整齐备的教养。

与此同时,又正因此才能想象,如此复杂而微妙的中日关系,如此需要强大平衡感的困难课题,一旦到了媒体的专家访谈那里,往往竟如此令人失望,要么一味宣扬一衣带水,要么一味指斥靖国神社。很少见到这样的专门家,能够基于自己的专门知识和专业立场,并非先意承旨地去演绎某些话语,而是去启迪和引导一种正确的阅读。

那么,除了那两种漫画式的前景,更广阔的正态分布究竟是怎样的?总不至于这两个重要邻邦,除了百年好合的这一极端,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另一极端吧?——由此真让人担心,这种对于外来文明的无知,特别是当它还是极其重要的近邻时,说不定到了哪一天,就会引发代价惨重的、原本并非不可避免的灾祸。确实,要是在人们的心理中,并不存在一个广阔的理解空间,还只像个无知娃娃那样奉行简单的善恶二元论,那就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作为一介书生，所能想出的期望有所改善的手段，也就只有号召进行针对性的阅读了，并且，还必须为此做出艰苦的努力，预先提供足够的相关读物；此外，鉴于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终将越来越走向民主化，所以这种阅读的范围，也就不应仅限于少数精英。正是诸如此类的焦虑，构成了这套丛书的立项理由——正如在上一套丛书中，我们曾集中引进了西方自费正清以降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眼下我们在新的丛书中，也将集中引进西方自赖肖尔以降的、有关日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

我们当然并不指望，甫一入手就获得广泛的反响和认同。回想起来，对于大体上类似的疑问——为什么满足理解中国的精神冲动，反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最新成果？我们几乎花去了二十年的不倦译介，才较为充分地向公众解释清楚。因而，我们现在也同样意识到，恐怕还要再费至少十年的心血，才能让读者不再存疑：为什么加强理解日本的途径，也要取道大洋彼岸的学术界。不过我却相信，大家终将从这些作者笔下，再次体会到怎样才算作一个文化大国——那是在广谱的意义上，喻指学术的精细、博大与原创，而并非只是照猫画虎地去统计专著和论文数量，而完全不计较它们的内在质量。

我还相信，由于这套丛书的基本作者队伍，来自我们二战时期的盟国，所以这些著作对国内读者而言，无形中还会有一定的免疫力，即使不见得全信其客观公正性，至少也不会激起或唤醒惯性的反感。此外，由于这些著作的写作初衷，原是针对西方读者——也即针对日本文化的外乡人——所以它们一旦被转译成中文，无意中也就有一种顺带的便利：每当涉及日本特有的细节和掌故时，作者往往会为了读者的方便，而不厌其烦地做出解释和给出注释；而相形之下，如果换由日本本土学者来处理，他们就不大会意识到这些障碍，差不多肯定要一带而过。

不待言，这面来自其他他者的学术镜子，尽管可以帮助我们清

洗视野和拓宽视角,却不能用来覆盖我们自身的日本经验,不能用来取代我们基于日文材料的第一手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不能用来置换中日双边的亲历对话,以及在此对话中升华出来的独自思考。而最理想的情况应当是,一旦经由这种阅读而引起了兴趣和建立了通识,大家就会追根究底地上溯到原初语境去,到那里以更亲切的经验,来验证、磨勘与增益它们。

无论如何,最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力的上升和自信的增强,中华民族终于成长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它在整个国际格局中所享有的内外条件,使之已经不仅可以向其国民提供更为多元和广角的图书内容,还更可以向他们提供足以沉着阅读和平心思考这些图书的语境。而这样一来,这个曾在激烈生存竞争中为我国造成了极大祸害的强邻,究竟在其充满曲折与陷阱的发展道路上,经历了哪些契机与选择、成功与失败、苦痛与狂喜、收益与教训,也已足以被平心静气地纳入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而借助于这样的知识,我们当然也就有可能既升入更开阔的历史长时段,又潜回充满变幻偶因的具体历史关口,去逐渐建立起全面、平衡、合理与弹性的日本观,从而在今后同样充满类似机遇的发展道路上,既不懈于提示和防范它曾有的失足,也不耻于承认和效仿它已有的成功。

我经常这样来发出畅想:一方面,由于西方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剧烈冲击,也许在当今的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区域,能比我们东亚更像个巨大的火药桶了;然而另一方面,又因为长期同被儒家文化所化育熏陶,在当今的世界上,你也找不出另一块土地,能如这方热土那样高速地崛起,就像改变着整个地貌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一样——能和中日韩三国比试权重的另一个角落,究竟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呢?只怕就连曾经长期引领世界潮流的英法德,都要让我们一马了!由此可知,我们脚下原是一个极有前途的人类文化圈,只要圈中的所有灵长类动物,都能有足够的智慧和雅量,来处理 and 弥合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曾经难免出现的应力与裂痕。

此外还要提请注意,随着这套丛书的逐步面世,大家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早先那套连续出版了一百多种,而且越来越有读者缘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其知识创化的原生态中,实则是跟这套“西方日本研究丛书”相伴而生的。作为同一个区域研究的对象,它们往往享有共通的框架与范式,也往往相互构成了对话基础和学术背景。而由此也就不难联想到,尽管西方的区域研究也在面临种种自身的问题,但它至少会在同一个地区谱系中,或在同一个参考框架下,把中日当作两个密不可分的文明,来进行更为宏观的对比研究——这就注定要启发我们:即使只打算把中国当作研究对象,也必须蔚成一种比对日本来观察中国的宽广学风,因为确有不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只要拿到中日对比的大框架下,就会昭然若揭,迎刃而解。

最后,由于翻译此套丛书的任务特别艰巨,既要求译者通晓英文,又要求他们了解日本,也由于现行的学术验收体制,不太看重哪怕是最严肃的翻译工作,给这类唯此为大的学术工作平添了障碍,所以,对于所有热心参赞此项工程的同侪,我既要预先恳请他们随时睁大眼睛,也要预先向他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并且——请原谅我斗胆这样说——也为他们万一有什么“老虎打盹”的地方,预先从读者那里祈求谅解。当然,这绝不是一个“预先免责”的声明,好像从此就可以放开手脚去犯任何错误了。可无论如何,我们想要透过这套书提供的,绝不是又有哪位译者在哪个细节上犯下了哪类错误的新闻,而是许多译者经由十分艰苦的还原,总算呈现在图书中的有关日本文明的基本事实——无论知我罪我,我还是把这句老实话讲出来,以使大家的目力得以穿透细枝末节,而抵达更加宏大、久远和深层的问题!

刘 东

2009年8月16日于静之湖·沐暄堂

序

如今的日本已经成为工业强国，在科学以及文化等领域都领先全球。正因如此，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同样是这个国家，百余年之前竟是一个与世界隔绝、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的国度。然而，事实上，在百余年之前——不，应该是更早的时候，已经有个别日本人投入异乎寻常的努力，极尽所能了解外面的世界，并逐渐发现了欧洲。阅读他们的著作和传记，就会发现近代日本从过去的混沌之中突如其来地跃入世界舞台，并非那样神秘。

18世纪和19世纪初，那些参与“兰学”运动的十几个人物引起我们的关注。如果要书写一部兰学运动的历史，作者可以凭自身的喜好，以十几个人当中的某一位为中心展开论述。在本书中，我选择了本多利明(Honda Toshiaki, 1744—1821)。无论是阅读利明的哪一部著作，只要翻开其中的一页，任何读者都能够与他共同感受到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那就是近代日本的黎明。利明的著作中孕育着一种崭新的精神——充满着不安、旺盛的好奇心以及敏锐的感受力。利明的内心深处有着对种种新发现的惊叹，对打开地平线的愉悦。在广为宣传日本不过是大千世界之中的一个小岛时，利明甚至感受到了某种快感。面对深信中国文明来自遥远的太古时代的日本人，利明告诉他们埃及文明比前者还要早数千年，并且更为优秀。世界充满着各种各样精彩的事情——当他发现这些事实之后，主张日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宝贝。利明尝试以西方人的眼光观察日本的各项制度，找到了许多日本必须改变的地方，那就是日本人在精

神和物质上的颓废。他的心中涌起了一种信念,日本必须成为世界大国才能克服这些颓废。

我在本书中试图分析 1720 年至 1830 年间日本洋学^①的发展以及产生的效应。1720 年是日本官方开始关注洋学之年。1830 年则是西博尔德被逐出日本之年,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日本危机四起,直到打开国门才得以最终解决。这两个年份之间的百余年是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这是日本知识分子与锁国制度抗争,冒着生命危险探索西方知识的年代。很多观点认为随后在日本发生的令人注目的变化应归功于佩里提督的黑船来航,事实上正是靠本多利明等先驱知识分子惊人的努力和热情才使这种巨变成为可能。

18 世纪,为日本人提供西方知识的主要是荷兰人。在叙述荷兰人行为的时候,我所采取的态度或许过于苛刻。我也深知,即便是描写当时身在东方的其他西方国家的商人,也会跟这些荷兰人一样缺乏魅力。然而即便如此,那些对身边美丽的风景人情漠不关心,甚至怀抱敌意的荷兰商人还是禁不住叫人愤慨。不过,这些荷兰人一定会提出相反的意见,正是他们所带来的新气象,才让本多利明等诸多日本进步人士在脑海里营造了他们想象中的新日本前景,而仅仅这些就足以让日本国民对荷兰人感恩戴德。

本书的初版发行于 1952 年。非常荣幸利用新版发行的机会,对一些错误进行了更正,并且加入了日本及西方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新版中我增加了发表在《通报》第 42 卷上的论文“平田笃胤与洋学”,还增加了两个新的完整章节,描述了一些比本多利明稍晚时代的日本人。尽管在少数情况下制作地图者的偏好发生了明显变化,我还是保留了旧版中的地理学拼写(如,库页岛从 Saghalien 变成了 Sakhalin,择捉岛从 Etorofu 变成了 Iturup,等等)。绝大多数插图都是新的,感谢中央公论社岩田才加先生帮助我获得这些相片。

① Western Learning 在日语中作“洋学”,本书特使用此译法。——译者注

第一版献给了我的母亲以及为本书制作了地图的友人威廉·狄更斯,两位在本书发行后相继离世。在此我要表达由衷的哀悼之情,并将新版再次献给天堂中的两位。

金冬楠^①

轻井泽, 1968 年

① 作者曾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当时的杭州大学做过一次专题系列讲座,讲座内容后来编辑成书在日本出版。书名为《日本文学是世界的桥梁》(原名为“日本文学は世界の架け橋”楠出版,2003 年),时任杭州大学王勇教授在后记中提到 Donald Keene 为自己取了一个汉名“金冬楠”。——译者注



日本人早期使用欧洲发明

插图说明

前页：日本人早期使用欧洲发明：井原西鹤的小说《好色一代男》（1682年）中的主人公与之介，9岁时就开始使用望远镜窥视女仆入浴。该插图出自井原西鹤本人之手。

1. 长崎港出岛上的荷兰商馆（第1章，第8页）：荷兰商船停泊在人工岛出岛，而中国商船（上图左上部分）则停泊在唐人屋敷（幕府指定的中国商人聚集地——译者注）。藏于长崎县美术馆。下图显示一座桥将出岛与长崎相连接，建筑包括仓库、馆长及其他荷兰商人的宿舍，还有日本官员、通事（译员——译者注）和士兵的办公室及住处。（18世纪下半叶。神户市立南蛮美术馆收藏）。（现为神户市立博物馆——译者注）
2. 司马江汉描绘的荷兰商馆馆长房间（第2章，第19页）：有关司马对该房间的详细描述，请见第19—20页。（出自司马江汉《江汉西游日记》，1815年）
3. 杉田玄白像（第2章，第25页）：石川大浪（1764—1815）画于1812年，杉田玄白时年79岁。（早稻田大学收藏）
4. 芝兰堂新元会图（第2章，第31页）：市川岳山画。描绘日本人第一次按太阳历庆祝新年。宽政六年闰十一月十一日，正值西历1795年元月1日，新元会在大槻玄泽的主持下举办，地点位于江户的芝兰堂，就是玄泽自己创办的学校。人们用刀叉品尝荷兰菜肴，喝的是荷兰酒。这段时期没有荷兰人逗留江户，因此身着西式服装坐在椅子上的人应该是一个日本人。有人断定此人是

黑屋光大夫,不过有可能正拿着羽毛笔写俄文的人才是光太夫。这位“荷兰人”大概就是玄泽本人。“荷兰人”手中烟管的正下方的是森岛中良,左边是他的兄弟桂川甫周。墙上的肖像画是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西方医学之父。芝兰堂的新元会每年举办,一直持续到1837年。(早稻田大学收藏)

5. 莫利斯·贝尼奥斯基男爵像(第3章,第39页):取自微型人像画。(贝尼奥斯基,《回忆录与游记》,伦敦,1904年)
6. 光太夫从俄罗斯带回的日本版叶卡特琳娜二世像(第3章,39页):画中文字是,“卡特里娜,挂轴,当今女皇叶卡特琳娜之像”。(龟井高孝教授收藏)
7. 光太夫在根室(第3章,第60页):光太夫(右)和一名译员,译员可能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1792—1793年,于北海道根室。(天理大学图书馆藏)
8. 光太夫与矶吉拜见将军(第3章,第61页):1793年10月20日,两个回到日本的漂流民在幕府将军的宫殿里接受质询。光太夫(左)的脖子上挂着叶卡特琳娜二世所赐的大勋章,嵌银丝的粉色绸缎礼服还带着红石钮扣,马裤的颜色和质地与上衣相同,脚上穿的是黑色波斯皮靴。矶吉手握毡帽,深蓝色毛料外衣,银色钮扣,黑黄条纹天鹅绒马裤。(见龟井孝高,《大黑屋光太夫》,第143—145页。龟井教授收藏)
9. 司马江汉自画像(第4章,第71页):(见《刻白尔天文图解》,“哥白尼天文学插图说明”,1808年)
10. 平贺源内画作(第4章,第73页):西洋妇人图。这幅著名的油画明显传承了某些欧洲风格。尽管这是源内所公认的唯一一幅作品,但是一些批评家仍怀疑它的真实性。(神户,市立南蛮美术馆)
11. 司马江汉的油画(第4章,第73页):这个制桶的场景是一组死心塌地忠于欧洲工艺的作品之一。作品揭示其来自欧洲的灵感

不仅体现在人物、建筑上,还体现在透视和明暗的画法上。(德岛,森操女士收藏)

12. 司马江汉科学实验图示(第4章,第96页): 上图右:“他人呼出的气就是我们吸进的气。这叫做淡水。”(司马江汉想说的是氮气,即“nitrogen”,不过他却写成了“淡水”,变成了“新鲜的水”。) 上图左:“人还没有认识到空气是如何强大,空气之于人正如水之于鱼。”下图:“口中喷出水就能看到彩虹的形状。阳光照射就会形成五种颜色”。(司马江汉,《刻白尔天文图解》)
13. 最上德内像(第6章,第141页): 作者“Toijos'ke”即画家川原庆贺,1826年创作于江户。画中写道,“日本最著名的地理学家”时年72岁。(西博尔德,《日本》)
14. 间宫林藏像(第6章,第154页): 间宫带着勘测仪器,为行动方便而将裤腿绑上。(茨城,间宫R.先生收藏)
15. 西博尔德画像(第6章,第158页): 川原庆贺(1786—1860)画作。(长崎县美术馆收藏)
16. 出岛上的生活(第6章,第163页): 川原庆贺《唐兰馆绘卷》中的两个场景,创作于1825年。其中一幅是荷兰人在岛上观察驶入长崎港的船只。女子抱着的婴儿或许是出生在出岛上的孩子之一,他们可能是荷兰商人和长崎艺伎之间的混血儿。中间个头矮小的人看上去是爪哇仆人。另一幅描绘出岛上的晚餐情景。爪哇仆人端着大浅盘,盘中盛放着某种动物的腿,右边两个艺伎摆着令人作呕的姿态。(长崎县美术馆收藏)
17. 生活在多毛发的阿伊努人当中(附录,第194页): 作者林子平,画中的文字是,“夷人正用鱼叉扎向海狗”。(出自《三国通览图说》,1786年)

目 录

总序 / 001

序 / 001

插图说明 / 001

第1章 生活在日本的荷兰人 / 001

第2章 蛮学的兴起 / 017

第3章 来自“莫斯科未亚”的奇怪故事 / 034

第4章 西方的呼唤 / 064

第5章 本多利明的经济思想 / 100

第6章 北方的探险者 / 134

第7章 平田笃胤与洋学 / 166

附录：本多利明之著作节选 / 185

日本发现欧洲年表 / 224

参考文献 / 232

译后记 / 244

第1章

生活在日本的荷兰人

18世纪末,极少数日本人开始付诸艰辛的努力,认真研究欧洲文明。此时他们关注的焦点位于长崎港内的弹丸之地上,这就是出岛。岛上略显破烂的交易所里住着十几个荷兰人。他们是当时仅有的被允许出入日本列岛的一群欧洲人。

日本国民并不是向来如此隔绝于西方。从1543年葡萄牙人发现日本到1639年被驱逐出境的大约一个世纪里,日本人获得了观察西方人生活方式的机会,其中还有几个人曾经游历过欧洲甚至美洲。然而,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非常了解对外贸易的种种益处,却因为惧怕基督教(1549年由圣·方济各·沙勿略传入)不断带来的威胁,于是连续发布禁令,最终除荷兰人以外,所有的欧洲人都被赶出了日本。

让日本政府如此困惑的,其实与基督教——此时为天主教的教义无关,倒不如说是因为惧怕皈依天主教的日本国民丧失对国家的忠诚,也惧怕这种情况会加快欧洲强国入侵日本。西班牙人开始布教后便很快征服菲律宾的先例让日本人警觉,而威胁日本主权的企图相继暴露后,幕府首先驱逐了西班牙人,接着又赶走了葡萄牙人。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当中,英国发现无法获益便主动退出了日本。或许是对贸易的嗅觉更为灵敏,只有荷兰人留在了日本。

虽然德川幕府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灭绝基督教,但他们发现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荷兰人的宗派对他们并无害处。1637—1638年,当数万名日本基督教信徒聚集在岛原半岛做最后的殊死顽抗时,荷兰